

海峡两岸企业网络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比较研究

罗 哲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兰州 730070)

提 要: 在两岸城市化发展历程中,经济因素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主体作用,特别是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使得市场环境中活跃的企业在城市化道路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当今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潮流中研究企业网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网络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并总结出两岸企业网络化与城镇化的基本规律,以期两岸城市化发展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企业网络;城镇化;海峡两岸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1)06-0045-05

一、引 言

城市化发展是特定地域空间的经济演化现象,但并不是单纯的空间经济理论所能解释。这一理念已为国内外城市化研究者所认可乃至接受。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并非单纯的人口在城市空间的集聚,而更多体现为一个城市空间的质化过程。这一质化过程,不仅表现在城市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也表现在企业的网络化集聚所产生的经济动能作为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而存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试图从企业网络与城镇互动的角度对海峡两岸城市化发展进行比较,以使两岸的城市化在互相借鉴中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体系。

理论界对企业网络和城镇发展是在两个范畴中开展研究的,基于企业网络与城镇互动关联性的研究并不多见。即便偶尔有之,也是散见于对企业网络问题的研究和对城镇发展问题的分析之中,仅作为一种理念出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网络是产业集聚的动因,也是产业集聚的结果,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城市^[1];盖文启^[2]认为随着区域内企业的连续诞生与成长,在区域内逐渐出现资源聚集成群的局面,这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马歇尔^[3]把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特定地区称作“产业区”,产业区内积聚着大量相关的小型企业,在这种区域中,拥有一种协同创新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积极的相互作用,竞争与协作并存,企业群与社会趋向融合,从而进一步融合成城市;王缉慈^[4]等认为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网络式空间开发模式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他学者^{[5][6]}认为区域内企业的网络关系与城镇化过程存在互动关系,两者互动的内在动力是竞争力,网络化的集聚企业借助城镇化进一步增强整体竞争力,城镇化借助企业的网络化集聚进一步增强城镇综合竞争力,两种竞争力相互促进产业升级。

可以认为,两岸城市化比较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理论研究滞后于现实发展的情况,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台湾狭小的面积与战前较高的城市化率是两岸学界忽略这一问题研究价值的根本原因。但是,笔者所走访的学者均不否认台湾工业化的成功及其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另外,作者曾以现有文献为据考察了台湾相关城市的发展历程,发现台湾城市化道路背后工业化的影响是明显存在的。推而广之,台湾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推进进而与企业网络、产业园区的关系如何?的确构成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同时,大陆城市化进程也较有特色,在其

城市化进程中企业网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两岸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两岸城市化进程差异较大,其中企业网络所起的作用应是主要原因。当然,这正是本文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企业网络化与城镇化互动

(一) 产业集群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健康有序的城市化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齐全的社会服务机构、完整的产业结构,等等,而这些城市景观的产生和运转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因此良好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产业集群通过内部的分工与合作网络而不断提高其集聚效应,使得区域集聚优势越来越强,从而会带来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地方城市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产业集群会带来两种显著的规模经济^{[7][8]}: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正如米尔斯和汉密尔顿所认为的那样,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开始和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这一发展过程可以认为是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 产业集群为城市化提供了人口集聚优势

基于企业网络形成的产业集群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和产业升级的动力之一。区位上的紧邻效应使得网络内企业对人才需求的专业知识、用工规则、工资待遇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为劳动力资源向集聚区空间集聚和城市人口空间结构的优化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城市化就是一个人口流动过程,在整个流动过程的起点是农村,终点是城市。在影响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居民为寻找改善物质生活的机会而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在短期内是有差别的。如果一个地区工资水平偏高,则将吸引别的地区的劳动力进入,由此将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是增加本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而把当地的工资拉低;二是减少其他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而把他们的工资提高。然而,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的工资率差异是长期存在的^[9],这就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

(三) 城镇化的服务需求和社会资本为企业网络化发展提供经济机制和社会平台

在企业网络化作用下,城市的空间扩张、质量提升得以进

行。城市的优势从两个方面开始显现。一是城市集聚的人口产生的服务需求对产业发展的拉动力,二是社会资本的形成从信息供给、生产经营协作等方面对企业网络化运行成本的降低和可能出现的企业道德危机的矫正。如果说,城市化的上述特征只是一种客观优势的话,那么,政府的适时引导与规划则是将其导向机制与平台的关键因素。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能就在于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产品,而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机制和平台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公共产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下,城市化的客观优势会加速转化,从而成为企业网络运行得以响应需求、降低成本为主的经济机制和社会平台,从而将企业网络化的效应进行低成本、高速度的传导。

三、两岸企业网络化与城市发展

(一) 台湾企业网络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历程

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以及准确抓住世界经济发展机遇,使得台湾经济发展有着极为显著的进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台湾城市也呈现出规模较大、管理规范、服务广泛的特征。鉴于台湾的经济发展特征和城市发展轨迹,由企业网络衍生的产业集群对台湾城市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台湾企业网络化的形成

台湾企业网络的形成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此时的台湾利用世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遇,根据岛内劳动力充足的优势,集中岛内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积极引进国外成熟的技术和资本,大力发展岛内制造业,比较典型的有纺织、服装、橡胶制品、电器元件和电器成品制造。这些产业所需技术和资本都不高,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这些产业也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比如说服装业,在成熟的制衣产业集群内聚集了众多的服装生产厂家,还云集了布料生产厂家、纺织厂、纽扣厂、服装设计公司、物流公司等众多相关企业,这些企业彼此之间的联系通道就是企业网络体系,在企业网络的联络下形成了分工明确、协作有序、互惠互利的产业集群。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产业结构呈现出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趋势,台湾地区利用已有的资本积累和产业积累优势,抓住国际环境提供的有利机遇,确立了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基础设施与重化工为中心的“十大建设项目”,其中七项为基础设施建设,三项为钢铁、造船、石油化工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石油化工建设成果巨大,其中石化行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新的企业网络格局;促进了远洋运输业、化工产品制造业等新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以石油化工为核心的化工产业链企业网络格局。

20世纪80年代后,受世界经济环境和岛内产业发展规律的影响,台湾开始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为岛内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90年制定的《国家建设六年计划》确立了通讯、资讯、电子、半导体、精密仪器、航空材料与成品、高功能材料、化学与制药、医疗、环保等十项技术层次高、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强、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因其产业特征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企业网络化特征,并催生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集群体系,对台湾经济影响深远。台湾服务业在工业进程的推动下为满足产业集群内部和工业化扩张下的各种需求而迅速发展,并成为了台湾经济的支撑主导力量。由于台湾是一个地域面积和市场容量都较小的地区,为更好地利用岛

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台湾大力发展以中小企业为载体的服务外包行业,在岛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网络。台湾的中小企业超过百万家,占台湾企业总数的98%,中小企业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吸引劳动力就业、刺激出口、提高岛内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2. 企业网络与台湾城市化

企业网络对台湾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网络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

台湾尽管存在官营企业,且官营企业占据铁路、公路、电力等优势产业,但民营中小企业则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下表所示,官营企业在1953年占据岛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其后由于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1960年以后民营企业成为岛内经济发展的主要构成体,1990年已占到岛内生产总值的81%,经济主导地位更加巩固。

表1 官营企业、民营企业的产值构成及增长率的变动趋势

时期 年份	产值构成		产值增长率		
	合计	民营企业	官营企业	民营企业	官营企业
1953	100.00	44.1	55.9	37.5	25.6
1955	100.00	48.9	51.1	17.5	10.6
1960	100.00	52.1	47.9	11.1	9.2
1965	100.00	58.7	41.3	21.3	10.1
1970	100.00	72.3	27.7	23.2	13.7
1975	100.00	77.9	22.1	9.4	4.4
1980	100.00	79.1	20.9	7.2	5.4
1985	100.00	81.2	18.8	2.7	2.5
1989	100.00	81.4	18.6	3.0	6.7
1990	100.00	81.0	19.0	-1.4	0.7
1953-1963	100.00	50.2	49.8	16.2	8.8
1964-1973	100.00	68.9	31.1	23.4	11.7
1974-1985	100.00	79.1	20.9	9.8	8.2
1986-1990	100.00	81.9	18.1	6.3	6.4

资料来源:摘自隅谷三喜男所著《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第144页。

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网络的作用,因为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多是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决定了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必须建立和其他企业的联系并产生集聚以有效地利用共同的基础设施、相关的原材料和技术、劳动技能相似的劳动力,从而企业网络得以建立;随着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企业间联系更加紧密,产业分工更加细致,产业集群度更高。虽不能轻易地把台湾经济的发展完全归功于企业网络的作用,但企业网络在台湾经济发展中也的确功不可没:企业网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有助于民营企业相互联合、相互抵御外来风险、相互交流以提高企业水平,为民营企业的成长起到了其他经济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民营企业又是台湾经济繁荣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可以认为企业网络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台湾经济的繁荣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以下方便:一是雄厚的台湾经济基础为台湾城市化提供了空间扩张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二是经济发展从内涵上提升了台湾城市化水平。当地政府有了充足的财政收入就会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当地医疗、教育、科研甚至其他城市文化景观的建设上,这在根本上提升

了台湾城市化内涵;三是经济发展为台湾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创造了条件,这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最根本力量。

(2) 企业网络为台湾城市化提供了人口基础

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的具体形态,产业集聚发生作用的载体和通道则是企业网络,只有企业间通过企业网络产生联系才能形成产业体系,进而为企业集聚创造条件。集群产生以后会促使许多相关产业的延伸发展,使集群内的企业可以得到专业化的服务,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些延伸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如交通运输业、技术服务业、专业销售公司、商业性印刷出版业、展览业、信息咨询业^[10]。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会吸引大量劳动力前来就业,而为企业集群服务的延伸行业因其具有服务的特性使得更有吸引劳动力前来就业的动力,因此形成了丰富的人力资源的集聚,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人口基础。

台湾地区的工业化取得实质性发展是从发展对外贸易开始的,这些服务外包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因此容易形成企业网络、出现产业集群。台湾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快速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大,1965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为61万人,1975年和1985年分别激增到152万人和249万人;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的需求引导下也获得了迅猛的发展,1955年就业人数为88万人,1965年增长到118万人,1970年为162万人,如表2所示:

表2 就业人口的产业部门结构的变化趋势 (千人,%)

年份	合计	第一产业部门	第二产业部门	制造业部门	第三产业部门
1955	3108(100)	1667(53.6)	560(18.0)	411(13.2)	881(28.4)
1960	3473(100)	1742(50.2)	713(20.5)	514(14.8)	1018(29.3)
1965	3763(100)	1748(46.5)	839(22.3)	612(16.3)	1176(31.2)
1970	4576(100)	1680(36.7)	1278(28.0)	958(20.9)	1617(35.3)
1975	5521(100)	1681(30.4)	1927(34.9)	1518(27.5)	1913(34.7)
1980	6547(100)	1277(19.5)	2774(42.4)	2138(32.6)	2497(38.1)
1985	7428(100)	1297(17.5)	3078(41.4)	2488(33.5)	3054(41.1)
1988	8108(100)	1112(13.7)	3450(42.6)	2798(34.5)	3546(43.7)

资料来源:摘自隅谷三喜男所著《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第179页

台湾的工业化是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的,其发展区位主要集中在农村或地方小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台湾工商企业有50%,制造业企业有55%是设在农村区域的,这种发展方式对台湾城市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农村地区随着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产业集聚区,并随之转变为城镇区域;二是一些中小城市随着产业繁荣发展,区域发展势头强劲为发展成为大城市提供了可能;三是随着岛内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许多农村居民或中小城市居民萌生了去大城市生活的意愿,大城市接纳的迁移人口逐渐增多,为大城市发展成为特大城市提供了人口集聚优势。

以台中市为例,1897年台中市人口不过2546人,1935年台中人口增长到70069人,光复时期其人口大概有15万左右且农业人口占大多数,从城市人口规模上来看属于典型的小城市。但随着台中市制造业的繁荣,其市区人口迅速增加,到1986年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占台中市人口的62%,成为城市人口增加的主要推动力;进入21世纪以后,台中市迅速调整产业结构,使商业、服务业成为地区GDP的构成主体,一方面使市区制造业向周边地区转移带动周边地区城市加速,另一方面使

市区人口迅速增加、城市规模大幅度扩张,进而成为台湾第三大都市区。目前台中市的总面积是163平方千米,人口66万,是台湾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区之一,是产业集群带动城市成长为中等城市,又由中等城市成长为大城市的典型。

(3) 企业网络的特性使台湾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减少了城市病

企业网络的作用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比较明显:一是因为中小企业规模较小,经营方式灵活,所以比较容易形成彼此间的联系;二是中小企业的设备和生产流程没有大型企业那样完备,所以有彼此间产生联系的需求动机;三是中小企业一般都是从事某一产品的一个生产阶段,这样企业间就有相互联系的必要。但大型企业一般都是一整套生产流程,本厂自己操作,所以没有企业间联系的动机。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推动力是大力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鉴于服务外包产业是投资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台湾的企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在中小型企业容易形成企业网络的推动下形成了诸如服装、食品、电子等形形色色的面向出口的产业集群,这种发展方式形成了台湾独具特色的城市化发展之路:中小企业在网络化作用下的集群使台湾许多农村地区就地转化为城市,由此形成了台湾独具特色的中小城市密集发展道路。这种城市发展道路使台湾并没有出现“如拉美和亚洲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大城市过度膨胀而导致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社会分化严重的现象,虽然城乡差距也比较明显,但不存在巨大的发展鸿沟,城市人口保持了稳定增长与适度规模。从发展角度看,在台湾工业化的高潮期也曾出现人口从乡村向城市、从南向北的流动现象,都市膨胀迅速。但由于总体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地区发展相对较为平衡,交通便利,工业布局较为合理,因而没有出现人口向大城市大规模流动与集聚的状况,发展最快的反而是中小城镇。在台湾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三个,分布在北中南三大都市区,而中小城市众多,达40多个,人口规模适中,一般在30万到70万之间,实现了城市化合理发展的目标”^[11]。

(二) 大陆企业网络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大陆城市化的主导因素,地方政府通过分权以后发展热情得到了空前提高,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苏南发展模式”、“温州发展模式”、“深圳发展模式”等,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地方经济形态和空间结构发生了强烈的变动,加速了地方城市化进程。

1. 大陆企业网络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的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民营企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国内著名产业经济学家王缉慈通过系统研究把我国产业集群分为五种^[12]:(1)一些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基地,如深圳—东莞,以及上海—苏州地区,经过近20年发展,地方产业集群初步形成,部分产业的企业分工配套网络渐成规模,但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压力;(2)在一些智力密集地区,如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扎堆”十分明显,但由于政策不到位和制度性因素,企业“窝里斗”和“内耗”相当严重,同行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合作,专业化分工不发达;(3)一些乡镇企业自然发展起来的集群,如浙江温州,以及河北清河等很多特色产业集群区域;(4)一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开发区已经吸引了知名的跨国公司,由于本地化的需求,带来或即将带来一系列配套企业,可能形成较大的企业集群;(5)一些以

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也面临企业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

2. 企业网络化与大陆城市化

鉴于产业集群是通过企业网络的作用而产生、壮大的,因此企业网络对城市化的影响可以通过产业集群的形式来具体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产业集群对大陆城市化的发展起到了以下推动作用:

(1) 为推动城市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动力支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以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群现象,这些城市群的形成与产业集群的推动密不可分:一是产业集群为城市发展打下了产业基础;二是产业集群为城市空间拓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城市化的内涵之一就是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但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是以基础设施建设的延伸和城市新区的修建为主要模式,但无论哪种模式都需要雄厚的资金做后盾。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以民营企业较为发达的浙江省为例^[13],目前浙江省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专业化产区或具有产业集群特色的工业园区,形成总产值5993亿元,约占地方工业总产值的50%左右,其中总产值10亿元至50亿元的集群有118个,50亿元至100亿元的集群有26个,100亿元以上的集群有3个,其中有56种特色产品产量全国第一。这些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是产业集群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城市是人口最大的集合区域,城市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物质供应,如丰富的食物、服装、休闲娱乐等等服务的供应。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化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市粮食、食品、布匹等基本生活资料供应不足,形成不了人口聚集的优势平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在保障粮食充量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轻工业,形成了制鞋、制衣、食品、饮料等等产业集群,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2) 为城市化提供了充足的人口

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区域,中小企业众多且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产业集群体系,这些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载体,形成了新一轮的人口迁移潮。全国范围内接受移民最多的区域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这三个地区也是我国产业集群最密集的地方。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口接收区,近年来上海净迁入人口197.9万人,浙江176.3万人,江苏74.1万人;以广东省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也是吸纳劳动力的有效“机器”,广东省年均吸纳人口大约216.6万人,相当于每年搬来两个百万人口城市;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是我国北方的重要人口辐射区,北京年均净迁入人口仅4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14]。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城市化的拓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口基础,为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3) 为城市带的形成创造条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政策的放松,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并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一般都分布在城市郊区或农村。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做大,乡村城市化现象随之出现,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久而久之城市地域就连成一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带体系。长三角区域内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几乎连为一体,目

前长三角地区共有直辖市1座、副省级城市3座、地级市11座、县级市67座、建制镇1479个,形成了中国最密集的城市分布区^[14]。大城市带的形成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并进一步为城市间的联合与融合创造条件。企业网络以其特有的作用必将为中国其他区域大城市带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促进两岸城市化发展的对策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两岸的企业网络形成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但因为涉及两个区域且两岸的政治、经济环境也不尽相同,所以文章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有层次、有重点地进行政策论述。其中宏观层次的对策建议是针对两岸在整体上、层面上的,微观层次的对策建议是针对台湾、大陆如何促进企业网络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 两岸整体视角上宏观层次的对策建议

促进两岸企业网络与城镇化发展从两岸整体视角上来看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两岸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两岸的城市化道路不尽相同,但各有特点,因此两岸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互相学习对方先进的发展经验,恰当地运用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去发展城市化。

2. 继续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地区企业网络化营造和城市化培育的重要条件,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关系较为紧张,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部分地区城市化发展滞后;随着两岸关系的回暖,两岸临近区域经济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城市化进程也在逐步加快;同时,两岸和平的发展环境也吸引了众多的台资企业来大陆进行投资,这对大陆企业网络的构建和中小城市的产生及规模扩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需要加强和维护两岸的长久互动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岸之间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的接触都趋于频繁,这不仅带来了两岸和平的发展环境,更是直接拓展了两岸经贸合作的领域和力度。台商在大陆进行投资设厂为大陆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陆资金流向岛内的事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台湾城市化质量,因此继续加强和维护两岸的交流互动机制是促进两岸企业网络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必要条件。

4. 需要进一步拓宽两岸经贸合作路径。台商投资一直是大陆吸引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台商企业在大陆许多区域已成为产业集群的主导力量,为大陆城市化发展特别是中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因为诸多原因大陆企业直接对台投资受到限制,因此大陆企业对台湾城市化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在ECFA签署与实施的背景下,尤其需要通过两岸的持续协商和台湾内部的政策松绑,推进台湾高端产业向大陆转移和陆资入台的双向合作进程,以使要素所搭载的企业网络化内在特质在两岸产业要素的流动中为两岸城市化提供更大动能。

(二) 两岸微观层次上的对策建议

1. 大陆微观层次上的对策建议

大陆的城市化进程较之台湾显得更为曲折,其企业网络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开始时间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针对如何促进大陆“企业网络化”与“城镇化”之间良性互动发展,文章提出以下建议:

(1) 强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中国大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遗留下的特殊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户籍制度已成为制约大陆城市化进程的一大弊端。人为地划分城乡二元人口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成本较大,造成城市各层劳动力需求不足,这对城市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应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居民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转移机制,为城市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撑。

(2) 建立完善的社保制度

大陆现阶段的社保制度远远适应不了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进行相应的改革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提供制度保障。应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制度,并探索建立“农民工社保”制度,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提供优质、高效的工伤、医疗、失业等相关社保,使农民工在城市能够安心工作、生活,以利于城市产业集群的继续扩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3) 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集群规划

大陆许多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没有一个科学可行的产业规划,导致许多区域的“工业园区”成为“空壳园区”,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应,产业集群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各地政府在进行“工业园区”规划时一定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规划,防止盲目跟风,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进产业集群的产生、发展,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

(4) 建立区域之间产业协调发展机制

大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群较为发达,企业网络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较为明显,但中西部地区则较为落后。因此,国家应该着手制定东部地区产业往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规划,根据中西部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展不同的产业,以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从而为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作出贡献。

2. 台湾微观层次上的对策建议

台湾城市化较为发达,企业网络带来的产业集群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也较为明显,在新时期如何继续巩固企业网络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成为文章思考的重点:

(1) 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

台湾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受全球经济影响较大,国际产业分工对台湾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台北、高雄、台中等市是全岛的经济重心和各类企业的集聚区,其国际化程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城市,这种发展态势充分显示出在全球化推动下,与国际产业分工网络相关的“自上而下”的都市化过程已经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的都市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台湾地区应该继续其全球化战略,敢于利用国际资源去强化其企业和城市化发展。

(2) 大力发展优质服务业

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对增加城市人口起到重要作用。台湾城市化基础较好,岛内拥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通畅的交通网络,同时岛内也拥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和本土大企业集团,因此大力发展符合台湾需要的优质服务业不仅能有效地服务于台湾企业,而且能够有效地增加台湾城市人口。

(3) 重视两岸交流和“三通”

两岸关系的改善对两岸都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尤其对于现阶段需要经济转型升级的台湾来说更是有利。在两岸关系新的发展背景下,两岸的经贸合作已经非常顺利,两岸经济的合作对台湾都市区的发展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台湾地区应该继续重视两岸交流,采取多种措施去保障“三通”的顺利进行,

鼓励大陆客商去岛内旅游、投资,从多个层面去推进台湾城市化进程。

五、结束语

在企业网络与城镇互动发展视角下,开展“台湾与大陆城市化道路比较”研究,既是对台湾城市化发展研究的宏观延伸,也是对两岸比较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主体的完善与深化。在两岸关系显著改善,经济合作已经进入制度化轨道的新阶段,进行该课题研究,从浅层次看,可为两岸制度性经济合作的深化和城市间经济的机制化合作提供理论准备与政策思考空间,而且可以为大陆不同发展程度的区域城市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依据。从深层次看,可为大陆工业化进程中的模式选取、城市化道路采择以及微观形态的工业发展如产业集聚、工业园区建设、企业网络生成与演进等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文章通过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并结合两岸实际情况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

1. 两岸企业网络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企业网络对城镇化的作用都较为明显,企业网络与城市化之间的关联性较大。

2. 两岸需互相合作以更好地推动两岸城市化进程。两岸同根同源,在城市化进程中应加强合作,为两岸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做到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以达到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双赢效果。

参考文献:

- [1] [荷] 布雷克曼等著. 地理经济学[M]. 西南财经大学文献中心翻译部译.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31.
- [2] 盖文启. 创新网络: 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45.
- [3]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商务印书馆, 1964: 65.
- [4] 王缉慈. 创新的空间: 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81.
- [5] 闫小培. 基于增长网络的城市空间生产方式变迁研究[J]. 经济地理 2010: 92.
- [6] 周立新. 家族企业[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103.
- [7] 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194.
- [8] 朱英明. 产业集聚论[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95—96.
- [9] 魏后凯. 区域经济学[M].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73.
- [10] 徐康宁. 产业集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2.
- [11] 盛九元. 台湾的都市化与经济发展[M]. 九州出版社. 2009: 69.
- [12] 张明龙. 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32.
- [13] 陆立军. 区域特色产业[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59.
- [14] 杨上广. 中国大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92—9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结构优化升级研究”(项目编号: 11XJY00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46批(项目编号: 20090460753)“基于企业网络与城镇互动发展视角的海峡两岸城市化道路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罗哲(1972—),男,理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

责任编辑: 董积生; 校对: 亚中